



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

地域與發展

李明輝・陳瑋芬 主編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當代儒學研究叢刊 ⑩

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 地域與發展

李明輝・陳瑋芬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地域與發展／李明輝・陳瑋芬主編．--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民 91

面： 公分．--（當代儒學研究叢刊；13）

ISBN 957-671-940-2（平裝）

1. 哲學 - 亞洲 - 現代（1900- ） - 論文，
講詞等 2. 儒家 - 論文，講詞等

128.07

91023695

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地域與發展

主 編 李明輝・陳瑋芬

執行編輯 張裕德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電話：(02)2788-3620；2789-9814

排版印刷 達雯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永福街 51 巷 11 號 2 樓
電話：(02)2388-0676；2388-0677

定 價 新臺幣 380 元

初 版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

修 訂 版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ISBN 957-671-940-2

目 錄

導言	李明輝	1
明清至近代的山西商人與儒家教化傳統	黃麗生	11
錢穆《國史大綱》之歷史觀分析	王晴佳	81
牟宗三先生的文學觀		
——以三十年代文藝思潮為背景	林月惠	115
徐復觀對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評論	黃俊傑	175
抗拒與復振的臺灣儒學傳統		
——由明鄭至乙未	潘朝陽	249
清代臺灣教育碑文中的朱子學	陳昭瑛	305
近代日本儒學的展開	澤井啓一	331
日本的自由民權思想與儒學	王家驊	367
和辻哲郎論間柄	楊儒賓	399
西田幾多郎的宗教哲學		
——以〈場所邏輯與宗教的世界觀〉為例	黃文宏	427
當代儒教在韓國的危機		
——借題提議展開儒教復興運動	金忠烈	451

導 言

李 明 輝*

「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以下簡稱「文哲所」）自一九九三年八月起推動的大型研究計畫。該計畫以三年為一期：第一期計畫以「當代儒家對時代問題的回應」為主題，由文哲所主任戴璉璋教授與當時尚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擔任系主任的劉述先教授共同主持，執行期間自一九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九六年七月；第二期以「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及其現代意義」為主題，由劉述先教授與筆者共同主持，執行期間自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一九九九年七月。在第二期計畫執行的最後階段，我們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六至八日在中央研究院舉辦了「儒學思想在現代東亞國際研討會」，邀請各方學者就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地（包括臺灣、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地）的現代發展，或者就現代儒學在整個東亞地區所面對的共同問題發表論文，加以探討^①。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

① 關於此一主題計畫的進行與研究成果，請參閱拙作：〈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概述〉，《漢學研究通訊》，總 76 期（2000 年 11 月），頁 564-571。

在這次研討會中共有二十三位學者發表了論文。其中，劉述先教授的論文〈儒學的理想與實際——近時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省〉已收入他自己的論文集《儒家思想意涵之現代闡釋論集》；筆者的論文〈儒家傳統與東亞的現代化——從李光耀與彭定康關於「亞洲價值」的爭論談起〉與朱泓源教授的論文〈儒之行者——沈慕羽於二十世紀的馬來西亞〉已收入筆者所編的論文集《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另有八篇則收入劉述先與林月惠二人合編的論文集《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問題與展望》。這些論文集均由文哲所出版，列入「當代儒學研究叢刊」。

本書共收錄十一篇論文，其中十篇係在此一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均經過審查與修改的程序。另一篇是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王家驊教授的論文〈日本的自由民權思想與儒學〉。此文原係王教授特地爲此一研討會所撰寫，但會前不久王教授突然來函告知：他必須住院接受手術，無法與會。因此，他的論文並未排入議程。但是會後我們還是按照既定程序對此文進行了審查工作。王教授雖有病在身，依然很認真地參考審查意見，修改他的論文。二〇〇〇年四月上旬，筆者隨同一個臺灣學者訪問團訪問南開大學歷史系。當時筆者特地向負責接待的張國剛教授探詢王教授的情況，希望能親自拜訪他。在得知王教授的健康情況不佳的情況下，筆者不敢冒昧打擾他。七個月後，王教授便不幸因骨癌而辭世。筆者與王教授始終無一面之緣，但在書信往返的過程中，筆者很深刻地感受到他認真負責的學術精神與煦煦春風的長者風範。如今重讀其文，對其思想之深刻與眼界之開闊深有所感，亦慨歎其辭世爲中國學術界之

重大損失。此文之刊出也代表我們對他的紀念吧！

衆所週知，儒家傳統是東亞文明的共同遺產，除了在其發源地中國大陸之外，對其周遭地區的文明發展也造成了深刻的影響。然而，儒家思想在傳入各地的過程中，由於當地的固有文化及其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之殊異，而必須面對遠較中土更為複雜的情勢。這使得儒家思想在各地呈現極為不同的面貌與發展過程。過去中文學術界的儒學研究很少留意儒學在中國大陸之外地區的發展；即使偶而留意到，亦往往不加反省地從中國本位的角度將儒學在這些地區的發展視為中國儒學之流亞或延伸，罕能從當地文化的角度深刻地反省儒學之輸入所造成的種種問題，例如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衝突、儒家文化與當地文化之衝突與調適、因儒家文化之「挪用」（*appropriation*）而產生的詮釋學問題等。「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二期計畫的重點之一便是要藉由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來顯示東亞儒家傳統的殊異性。此外，由教育部支持、黃俊傑教授主持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目前正在積極進行，其研究重點即在於上述的詮釋學問題。

在本書所收錄的十一篇論文當中，涉及中國大陸的有四篇，涉及臺灣的有兩篇，涉及日本的有四篇，另有一篇涉及韓國。在涉及中國大陸的四篇論文當中，第一篇是黃麗生教授的〈明清至近代的山西商人與儒家教化傳統〉。此文藉由探討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商業活動與儒家傳統之關係，重新省思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有關「資本主義精神與儒教」的學說。作者基本上相信：儒家傳統在一些相關條件之配

合下，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其探討與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②及貝拉（Robert N. Bellah）的《德川宗教》^③屬於同一類型。第二篇是王晴佳教授的〈錢穆《國史大綱》之歷史觀分析〉。作者一方面追溯錢穆《國史大綱》之形成及其時代背景，另一方面將此書所代表的「民族史學」與德國的「歷史主義」加以比較，發現兩者之間頗有相通之處。這種比較有助於為錢穆的史學思想加以定位。

第三篇是林月惠女士的〈牟宗三先生的文學觀——以三十年代文藝思潮為背景〉。近年來文哲所「當代儒學研究室」協助編輯《牟宗三先生全集》，蒐羅了不少牟先生早年發表的論文。由於這些論文係在動亂的三、四十年代所發表，故蒐求不易。過去數年間，筆者曾親訪美國東西岸的大學圖書館及國會圖書館，並獲得大陸友人之協助，在大陸各地的圖書館蒐求，最後由筆者與黎漢基博士合編成兩冊的《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近日將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在這個文集中所收錄的許多文章久已不為人所知，連牟先生早年在臺灣的親炙弟子都沒看過。牟先生生前曾多次提到：他早年曾寫過一系列的〈說詩一家言〉，可惜他自己手邊已無這些文章。及至牟先生逝世後，筆者才找到這批資料。牟先生早期著作之「出土」，對於

② 此書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於1987年出版。

③ 此書原是貝拉於195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提出的博士論文，1957年以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為題，由紐約的 The Free Press 出版。1985年此書由同一出版社印行平裝本時，副標題改為 *The Cultural Roots of Modern Japan*。此書有王曉山與戴茸的中譯本：《德川宗教：現代日本的文化淵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全面了解牟先生的思想，具有極重大的意義。其重要性差可與諾爾（Herman Nohl）所編的《黑格爾早期神學著作》（*Hegels theologische Jugendschriften*）相提並論。因為牟先生在其早期著作中，除了討論哲學問題（尤其西方的現代邏輯）之外，還廣泛評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學、歷史等問題。它們所呈現的形象決不是一個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哲學家，而是一個興趣廣泛、現實感極強的行動家。迄今猶有不少人誤以為牟先生對文學、藝術毫無興趣，對政治、經濟等現實問題少有關懷。筆者相信：只要他們通讀過牟先生早期著作之後，對他的印象必定會有所改觀。林女士此文便是根據這批資料所撰寫。作者除了完整地介紹牟先生對於文學的理解、創造與鑑賞之看法外，還將它放在三十年代文學論戰的背景下為它定位。根據作者的分析，牟先生以哲學家的眼光，直探「文學的本質」這一核心問題，並以批判的態度，汲取中國傳統文學的資源，吸納西方文藝的新思潮，藉以建構其獨特的文學觀。他進而根據這套文學觀，強烈駁斥三十年代左聯「革命文學」的理論盲點與方法論謬誤，同時也超越胡適「文學革命」與學衡派的視野，見到新舊文學前後相承的發展。這是第一篇完整地介紹並評論牟先生的文學觀之論文，具有開創之功。筆者期望有人繼續探討牟先生、乃至當代新儒家的文學觀，以彌補迄今為止的新儒學研究在這方面之不足。

接下來的是黃俊傑教授的論文〈徐復觀對日本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評論〉。黃教授從徐復觀先生的大量著作（尤其是其數量龐大的雜文）中爬梳出後者對於日本民族及其政治、社會、文化的觀察與評論。徐先生曾一度到日本留學，對日本社

會有直接的接觸，加上其史學家的獨特眼光，故其評論具有歷史的深度，迄今猶極具參考價值。去年由筆者與黎漢基博士合編的《徐復觀雜文補編》六大冊終於由文哲所出版了。這套書蒐羅了徐先生尚未結集成冊，或雖已收入文集、但因政治顧忌或其他原因而有所刪改的詩文，共兩百萬字。它為徐先生思想的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也為《徐復觀先生全集》之編纂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在新儒學諸大家中，迄今僅有徐先生與張君勱先生尚未有全集。筆者在此呼籲徐先生的門弟子及有文化使命感的出版社挺身而出，促成《徐復觀先生全集》之出版。

有關臺灣儒學的兩篇論文是潘朝陽教授的〈抗拒與復振的臺灣儒學傳統——由明鄭至乙未〉與陳昭瑛教授的〈清代臺灣教育碑文中的朱子學〉。潘教授的論文以相關的史料為依據，分別從「抗拒」與「復振」這兩個角度來闡述臺灣儒學傳統自明鄭到乙未割臺的發展。陳教授的論文則是分析清代臺灣孔廟與書院的碑文內容，藉以證明福建朱子學是清代臺灣儒學的主要思想淵源。近年來，「臺灣儒學」這項課題已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潘教授另外出版了《明清臺灣儒學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一書，陳教授也出版了《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年）一書。此外，林慶彰教授所編的《日據時代臺灣儒學參考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年）也極具參考價值。

在涉及日本的四篇論文中，第一篇是澤井啓一教授的〈近代日本儒學的展開〉，這是本書所收錄的論文當中最具有方法論意識的一篇。作者主張以「實踐」（practice）的觀點取代

「言說」(discourse) 的觀點，來分析日本儒學的發展；或者更準確地說，他試圖說明日本儒學的「言說」與「實踐」的生產／再生產之相互作用。如果從過去多數學者所採取的「言說」觀點來看，「日本儒學史不過是誤讀與誤解中國儒學的歷史而已」。但是從「實踐」的觀點來看，這種誤讀或誤解必有其「道理」可言，因為它反映出某種「實踐」。進而言之，由這種「實踐」又會產生出一種新的「言說」，這便形成一種「實踐」與「言說」間的循環。筆者在上文強調不要從中國本位的角度、而應從當地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儒學在東亞各地所表現的殊異性，澤井教授的方法論正可呼應此義。

接下來的兩篇論文是王家驊教授的〈日本的自由民權思想與儒學〉與楊儒賓教授的〈和辻哲郎論間柄〉，它們為澤井教授的方法論提供了具體的例證。王教授的論文分析日本近代民權論者中江兆民（1847-1901）與植木枝盛（1857-1892）如何借用儒家思想（特別是孟子思想）的資源來接引西方的自由民權思想。其實，這種「借用」在近代中國亦屢見不鮮。譬如，劉師培（1884-1919）於清末撰成《中國民約精義》一書，此書蒐羅中國古籍中他認為與民權思想相關的言論，其範圍由《周易》到清儒戴望。其後的梁啟超、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也曾試圖說明儒家傳統與西方自由民權思想間的關聯。迄今猶有不少學者堅持西方的自由民權思想與儒家傳統完全不相干，一見到有人借用儒學的概念來詮釋自由民權思想，便斥之為「比附」。然從文化詮釋的觀點來看，「比附」、「挪用」與「創造性詮釋」之間是否有明確的區別，其實大有疑問。即使是「比附」，我們依然可以按照澤井

教授的方法論，就此追問：何以會出現這種「比附」？這種「比附」實際上產生了何種歷史效應？王教授在論文的最後部分區分「價值的座標系」與「功能的座標系」，並強調從後一觀點來考察儒學與自由民權思想的關係之必要性，可視為對這類質疑的回應。

楊教授的論文探討日本京都學派哲學家和田哲郎（1889-1960）的「倫理學」。這種「倫理學」是以「間柄」為核心的「人間之學」（即人學）。所謂「間柄」，是人與人之間的特殊關係，依和田的分析，它具有社會性、歷史性與地理性。筆者的概括不免過分簡略而失其血肉，楊教授的說明則頗能抉發其豐富而曲折的義蘊。依楊教授的說明，和田的「倫理學」顯然具有深刻的儒家傳統背景，但又帶有鮮明的日本特色，即重視人倫日用的現實性。這也顯示了東亞儒學傳統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

接下來的論文是黃文宏教授的〈西田幾多郎的宗教哲學——以《場所邏輯與宗教的世界觀》為例〉。作者以另一位京都學派哲學家西田幾多郎（1870-1945）的「場所邏輯」為例，來說明西田遊走於東西哲學／宗教之間的獨特思路。西田藉以描述宗教經驗的理論似乎不難在西方的泛神論哲學中引發共鳴。譬如，他將「實在」與「邏輯」的關係視為非一非異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令人不由得想起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 1632-1677）的「同一哲學」（philosophy of identity）。而他藉以說明「相對者」與「絕對者」之關係的「逆對應」概念也可對應於西方神秘主義哲學家庫撒努斯（Nicolaus Cusanus, 1401-1461）的「對立的協合」（coinci-

dentia oppositorum) 之說。然而，西田的「場所邏輯」卻有不折不扣的東方哲學／宗教傳統的背景。論者通常強調其禪宗背景，作者則將其思想背景擴大為儒、釋、道三教共有的「超越即內在」之思惟模式，可謂卓識。

本書所收錄的最後一篇論文是金忠烈教授的〈當代儒教在韓國的危機——借題提議展開儒教復興運動〉，這也是唯一關於韓國儒學的論文。關心韓國儒學發展的人通常會對韓國的社會現狀^④感到迷惑：一方面，相對於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等華人社會，韓國社會在實際生活的層面保存了更為明顯的儒家特色；但在另一方面，南韓基督徒（包括新、舊教徒在內）所佔的人口比例遠高於日本及上述的華人社會，大約達到 30 %。一方面，近代韓國並未像中國那樣，出現長期而大規模的反儒家思潮；但在另一方面，韓國同樣未出現與中國的「當代新儒學」可以相提並論的「韓國新儒學」^⑤。金教授在文中提到《孔子不死，國無以存》一書，該書的作者金經一曾在臺灣留學，獲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由於韓國儒學並未像中國儒學那樣，經歷過全盤性反傳統運動的洗禮，故該書之出版對韓國學術界造成極大的衝擊。因此，金忠烈教授在論文中表現了強烈的危機感，並倡議在韓國發起「儒教復興運動」。筆者在此不免想起杜維明教授所提到的一個關於儒學批

④ 由於我們對北韓的情況所知有限，故此處所論，僅限於南韓。

⑤ 近年來也有韓國學者試圖建立「韓國新儒學」的系譜，但無論就理論規模還是就影響力而言，「韓國新儒學」均遠不及於中國的「當代新儒學」。關於「韓國新儒學」，請參閱鄭仁在：〈韓國現代新儒家之形成及其展開〉，收入李明輝編：《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頁81-124。

判的「悖論」：「西化知識分子對儒家傳統進行學術文化的批評，其結果對孔孟之道的精義不無釐清的積極作用。相反地，企圖利用先聖先賢以維護既得利益的軍閥政客，不僅沒有達到推行孔教的目標，反而把儒家的象徵符號污染了。」^⑥有志於保存並發展儒家傳統的韓國朋友除了從正面弘揚儒家思想之外，還應準備接受儒學批判的挑戰，讓韓國的儒家傳統能在浴火中重生。

此書與其姊妹篇《現代儒家與東亞文明：問題與展望》之出版標識了「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第二期計畫之完成。在這兩本論文集之外，同屬於「當代儒學研究叢刊」的另四本論文集《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總論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日本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中國大陸與臺灣篇》、《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韓國與東南亞篇》也是此一計畫的集體成果。藉由這些成果，我們期望能幫助讀者更深入而完整地瞭解儒家傳統在東亞各地的發展——不但了解其普遍性，也了解其殊異性；不但了解其成就與功能，也了解其問題與限制。

⑥ 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見其《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大陸講學、問難和討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頁278。

明清至近代的山西商人與 儒家教化傳統

黃麗生*

一、前言

臺灣與其他東亞地區近五十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乃至於現代化的成就，自一九七八年以降即引起中外學者探討其是否與儒家傳統有關？此一論題顯然受到韋伯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題的啓發。不過有關儒家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的課題，並非僅只近五十年臺灣及其他東亞地區的現代化經驗可供探討。已有學者注意到：在現代化以前即已長期活躍於中國域內外的明清商人，就有相當的儒家教化的背景。

儒家教化的傳統，是中國文明經數千年歷史演進所形成的，以儒家經典和價值體系為核心的人文教化機制；其影響層面廣泛，涵蓋了中國文化的大、小傳統，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它不但表現在教育和科考的活動中——私塾、書院和各級學校、政府機構的教育、學術和科考取才，都以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歷史組副教授

儒家的經典和義理爲主要的內容和標準；也表現在由個人以至家庭、鄉里、家國、天下層層相扣互爲聯繫的組織關係和倫理道德意識之上；更表現在一般百姓講求天道人倫，彝則有序和崇善抑惡的民俗和宗教信仰中。換言之，儒家教化的傳統是中國傳統社會以儒家的人文思想爲中心，經由不同的通道傳播，復在各個層面上產生作用，兩兩相孚，長期涵養而成的一種廣泛的文化機制。它不但主導傳統中國學術思想的積累和政治社會的結構和運作，也影響無數百姓的價值意識、人倫規範和日常生活。明清商人所具有之儒家教化的背景，即是此文化機制的產物。

以山西商人來說，他們是崛起於明代的地緣性商幫，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才完全停止活動，在明清以降長達五百年的中國經濟史上一直佔有重要席位。他們曾在明朝中葉，利用時機催生了由征戰掠奪到和平互市的漢蒙關係；迨至清代則利用滿族締造的遼闊幅地，建立了遍及中原、蒙古、新疆乃至於俄、日等域外地區的經貿網絡，歷久不衰；還在十九世紀創立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票號，而山西票號一直到廿世紀初，對中國的金融都還有相當的影響。西力東漸以降，山西商人在危局中迎接現代化的挑戰，間有得失，但終不免沒落。總其興衰歷程，處處留有儒家教化的痕跡，留下了不同於學案的儒學研究資料。

山西在明代以後並沒有重要的儒學派別出現，甚至應試中舉的員額都相對較少。清初晉省人士學而優則商，而不以第一流人才讀書應試的觀念，曾令清廷印象深刻。但自明代起，晉商已有尊儒重商，儒商相通的價值觀念；從人才培

育、集資入股、員工福利，到管理方式都可見到儒家的價值觀；直到清末，猶有山西商人秉持儒學應變求新的思維，鼓吹將票號改組為現代銀行。另一方面，不少山西商人除了有儒士的生活品味外，也頗致力於社會公益活動，並成為推行地方儒教的重要力量。這些都反映了明清以降，山西固無大儒，但山西商人仍深受儒家教化傳統的影響。此一特點，就儒學發展史而言，自不會是毫無意義；而且若要深度了解山西商人，也唯有透過「儒家教化傳統」的觀察角度，才能掌握其經濟活動與其思維方式和價值信念之間動態的關聯性。

此外，針對山西商人與儒家教化傳統作關聯性的探究，也有助於了解：在前現代化時期以迄近代西力衝擊後的經濟活動進程中，儒家到底居何地位？並可藉此觀察儒家教化與商人活動的相互關係，有何一貫的延續性和歧出的演變性？就儒家傳統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的課題而言，此將提供更廣闊的論證視野，可與以當代東亞經濟發展為核心的相關論述對話。

本文將期透過山西商人尊儒重商的傳統、商人人格的確立、商業倫理與組織、應變與困境等面向，探討其所反映之儒家教化的內涵與特質，並分析其中一貫延續與歧出演變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以探討論證明清迄至近代山西商人與儒家教化傳統的互動關係。此其間，除了回應當代有關儒家傳統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外，並思詮論儒家價值對經濟發展乃至於現代世界的可能意義。